

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

教学参考资料选辑

第 四 辑

D091.5/1

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
教学参考资料选辑活页
()



20843091

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声明

(一九三八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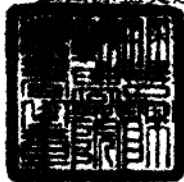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月一日，日内阁会议讨论对于武汉陷落后之新情势，日本所应采之方针，决定以日政府之确固不动方针与态度，向内外作重大声明。二日近卫首相参宫，奏陈日皇。三日以政府声明形式发表，在此声明中，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口号。

今者日本海陆军，藉皇上威棱，攻取广州，克武汉三镇，戡定中国要地。国民政府，业不过成一地方政权。但该政府，倘仍固执容共抗日政策，则日本不至其溃灭，断不收兵。

日本所冀求者，在建设一可以确保东亚永久安定之新秩序，此次征战之究极目的，亦在于此。

此新秩序之建设，以中日满三国相提携，在政治，经济，文化等各方面，树立互助连环关系，为其根干，并期东亚国际正义之确立，共同防共之达成，新文化之创造，与经

此实所以安定东亚而贡献世界之进展也。
于中国者，在分担此项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，
理解日本之真意，以应日本之协力。倘国民



843091

政府，放弃向来之指导政策，更换其人事之构成而举更生之实，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，则并不加以拒绝。

日本深信列国，亦将正确认识日本之意图，而适应东亚之新情势，尤其各同盟国历来之厚谊，至堪称道。

惟东亚新秩序之建设，渊源于日本肇国精神，完成此项建设，为现代日本国民光荣之责任，日本其应断然实行国内各种必要之革新，力图国家总力之扩充，排除万难，向达成斯业之前途，鼓勇前进。

政府于此声明日本不动之方针与决意。

（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——

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——）

（录自汪伪宣传部编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

1941年3月版）

日本内阁总理大臣

对于政府声明之解释

(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)

日本政府发表十一月三日之声明，同日近卫首相作广播演讲，对于该项声明，予以详细之解释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，共成为重要文献。

本日恭逢明治圣节，追维明治天皇之盛德，关于天皇遗业东洋和平之确立，余得陈说政府所见，实最光荣。今继攻陷广州之后，中国内地心藏之汉口，亦归吾有。包有支配近代中国全机能之七大都市全线之庞大地区——所谓中原者，全在日军掌中。制中原，即制天下，蒋政权，事实上已降成一地方政权矣。

另一方面，日本一面保留其足以排击外来干涉之充分精锐战斗力，一面泰然获得战果。皆由忠勇将士，藉皇上威棱，奋斗所致，日本国民之感激，至于无可比拟。

顾追溯此光辉之战果，国民务应先向数万之战死者与负伤者，表示感谢。对此可敬之牺牲者，吾人有二种义务，第一为继承此等牺牲者之遗志，充分贯彻战争之目的。第二为毋忘酬谢此等牺牲者之遗族家族。

今对于中国，应如何处理其锁键，全操于日本之手，但日本之真正希望，不在中国之灭亡，而在中国之兴隆，不在

中国之征服，而在与中国协力。日本愿在东洋人之自觉上，与已经觉悟之中国国民相携手，建筑东亚真正安定之天地，实则认识中国民族之热情，与中国必须完成独立国家，如日本之切实者，世所无有。在东亚邻接而亲近之日本，满洲，中国三大国，应一面充分发挥各自之个性，一面在保全东亚之共同使命下，造成坚固结合之关系，实为历史上之必然。

但在中日两国间，此种理想之实现，在国民政府之错误政策下，业被阻止，诚不特日本，为全东亚，亦不胜遗憾之至。原来国民政府之基本主张，系沾染欧战后反动期之一时风气，甚属浅薄，断非根据国民政府本来之良知良能，尤其为维持其政权，而不择手段，不顾激成中国赤化与殖民地化之形势，对于建设新中国，而奋身苦斗之几多忧国先辈，不能不谓为叛逆。此日本所以内心虽不欲演出东亚二大民族同文相战之悲剧，而为打倒蒋政权，仍至于用武。

日本现在切望中国之觉醒，中国先忧后乐之士，应速使中国复归于本来之道路，率更生中国，为东亚共同之命运而蹶起奋斗。今北平南京，更生之机运，已甚活跃；蒙疆地方，蒙古复兴之空气，亦颇旺盛。经五千年长久历史而几度在世界文化上大放光明之中国民族，发挥其伟大力量，分担建设东亚之大业，而在世界文化上，重放新的光明，留一不辱祖先之历史，此其时矣。

即国民政府，倘回复此中国民族向来之精神，更改其从来之政策与人事之构成，完全为一更生政权，而从事于中国之再建，则日本自然不加拒绝。

世界各国，今亦为对此东亚新情势之展开，明确认识之时。向来中国之天地，成为各帝国主义野心角逐之牺牲，和

平与独立，早被威胁，此征诸历史，可以了然。日本今后对此事态，认为有根本修正之必要，并希望确立基于正义之东亚真正和平体制。

日本自然不排斥列国之协力。又对于第三国正当权益，亦无意加以破坏，倘列国理解日本之真意，就此东亚之新情势而商讨其政策，则日本为东洋和平之故，不惜与之协力进行。

日本与共产主义战斗，早具热忱，世界周知之事实。国际共产党所企图者，为东洋之赤化，为世界和平之扰乱。故在蒋政权所谓长期抵抗之背后，妄动之赤化根本，日本断乎使其绝灭。所幸防共联邦德意志义大利，对日本在东洋之意图，抱有同感。此次事变，该两国所予之精神援助，颇足鼓励日本国民，吾人殊应称道，经此事变，此盟约不但感有益加紧密之必要，并应进而在共同之世界观下，协力重建世界秩序。

现下之世界秩序，实应在真正公允均衡之上，建筑和平。过去诸原则，事实上在使不均衡之现状维持，成为铁则化固定化，乃属无可否认。如联盟规约之国际条约，业已失其权威，其根本原因，实即在此不合理之现状维持，举凡通商、移民、资源、文化等人类生活之各部门，国际正义，咸已不过为一具文。吾人一面应立于此各部门统合之观点，而适应现实，一面应随历史之发展，而创造新和平体制。且确信具备以上各种条件，为克服现下一般危机之惟一手段。

全国国民，一面绝对信赖战场之勇士，一面充实长期战之姿势，此全国国民之姿态，乃正以日本人本来之面目，再现于现代。日本之消长发展，常与国民对国体上之自觉，相互

并行，日本历史，所如实证明者也。

日本皇室所珍念者，恒在东洋永远和平之确立。我等日本臣民，体察于此，则知道德使命之重大，不能不恐惧而感激。

今日本国民，应肃然正襟，直视其课于自身之责任。关于“联合东亚诸国，在真正立于道义基础之自主的连系上，而建设新组织”之任务，有如何意义，求如何牺牲，须要如何准备，应具彻底之理解，断不能错误认识。倘以为汉口广州占领，太平时代，立即到来，此种思想，并不理解此次事变之重大意义，天下亦无较此更大之危险也。

担当新东亚建设之日本，其国民生活之全分野，业入于新的创造时代。其意义，即真正之战争，今方开始。吾人欲为真正伟大而具有历史性之国民，应上下一致以坚定之信念与决意，向内外之整备建设，鼓勇前进。

（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——

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——）

（录自汪伪宣传部编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

1941年3月版）

近卫首相声明

(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)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近卫首相根据庙议所决定之中日调整国交之根本方针，发表谈话，与十一月三日政府之声明及同日近卫首相对于该声明之解释谈话，同为表示日本明确之态度者，此十二月二十二日谈话即通称为近卫声明者，汪主席艳电系见此电而发出之反醒。

政府如本年二次声明所示，始终一贯，对抗日国民政府，期以彻底的武力扫荡，同时与中国同忧之士相携手，而向东亚新秩序之建设迈进。

今中国各地，更生之势，彭薄兴起，建设之气运，亦渐高涨。兹将政府与更生新中国调整关系之根本方针，阐明中外，以期贯彻日本之真意。中日满三国，应以东亚新秩序之建设为共同目的而结合，并应共举善邻友好，共同防共，经济提携之实。

欲达此目的，中国方面，先行清算旧有之偏狭观念，放弃抗日之愚见与对满之拘泥，比任何为必要。即日本率直希望中国进而与满州完全修复邦交。

其次，在东亚之天地，不许国际共产党势力之存在，故日本以为取法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，而缔结中日防共协定，在中日国交调整上，为切要之事项。又鉴于中国之现状，对防共之目的，欲其能有充分保障，故在该协定继续期

间，要求承认日本军，在特定地点之防共驻屯，及以内蒙地方，为特殊防共地域。

关于中日经济关系，日本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的独占，亦并非要求中国“限制理解新东亚，并适应而见诸行动之善意的第三国之利益”等举措。仅充分期望中日提携合作，而有实效。

易言之，立于中日平等之原则上，中国容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，有居住营业之自由，促进中日两国民之经济利益；且鉴于中日间历史的经济的关系，特在华北及内蒙地域，于其资源之开发利用上，对日本予以积极的便利。

日本所要求于中国之大纲，如以上所述。日本毅然发动大军之真意，如能贯彻，则所求于中国者，不在区区之领土，亦不在战费之赔偿，自可明瞭。

日本实要求中国，在实行新秩序建设分担者之职能上，所必要之最小限度之保障。日本尊重中国主权，固不必言，并不惜进而对于撤废其完成独立上所必要之治外法权，及交还租界，予以积极的考虑。

（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——

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——）

（录自汪伪宣传部编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

1941年3月版）

汪先生和我

(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)

近卫文麿

中国近将由汪精卫先生等树立新中央政府，中日间明朗而充满希望的国交，已可预期，诚足欣慰。我们在过去二年余间，付历史上未有先例的重大牺牲而战，亦仅待望此日之到临而已。我们并非好战而战。也不是欲使中国毁灭而战。我们是为建设俯仰天地而不愧的东洋永久平平而战。本来，中日满三国，是应该相互提携，处于一个有机的联带组织下的。然中国多年的抗日训练，我们愈是忍耐，他们愈是变本加厉，结果所届，将做赤化势力的奴隶。因此之故，我们痛感到，不仅为保障日本安全，为正义与人道，为东亚百年大计，不得不和中国的抗日政府战，将其根本破坏之后，和中国的健全分子，共建东亚新秩序，乃我们的使命；我们乃派膺惩之师，前往大陆。这是日本国民命运中注定的巨业。我们不亲手加以解决，我们的子孙也非加以解决不可；但叫我们的子孙去做，其艰难将遥甚于今日。

我们一方面勇猛进攻，同时我们瞬时也没有忘记向中国的健全分子伸友情之手，援助其崛起。兹者汪精卫先生奋起，中央政府，行将诞生。我自事变以来，迄本年一月我主宰之内阁总辞职的期间内，尝作一切努力，期收拾事变。尤其上年十一月底，举行御前会议，决定处理事变的具体方法，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遂将其大纲阐明于中外。此即所谓“近卫声明”。由此声明，我人作战的目标，已甚明显。申

言之，中日满三国，拟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的之下团结，实践善邻友好，共同防共及经济提携之原则。既结善邻友好之关系，则放弃过去的偏狭歪曲观念，改变抗日侮日，和满洲国修交，乃当然之事。东亚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势力的存在，征之我国国体，乃当然又当然之事。故既和我国提携，自然非缔结防共协定不可。欲奏防共之实效，则在协定有效期内，承认日军之为防共而驻屯于指定地点，内蒙与外蒙接壤，故规定之为特殊防共地域，也是必然的措置。我国不欲独占中国的经济利益。也不要求中国排斥凡理解东亚新事态，而愿合作的第三国的利益。我们愿于平等的立场，促进中日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。不过在华北和内蒙，因历史的及经济的关系，我们要求中国积极地给予开发及利用资源上的便利。以上的要求，乃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分担者，于遂行其义务时的最小限度；我们现拟向中国提出此最小限度。只须此要求能满足，我们不对中国要求领土，不要求赔偿战费。尊重中国的主权不必说，将来尚拟更进一步，考虑撤废治外法权，交还租界。国家间武力抗争的解决条件，具有如此的道义性，在历史上尚未有先例。因此之故，我们敢称中日事变为圣战。

×

×

×

由此声明，汪先生豁然有悟而崛起。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离重庆至河内，二十九日发表和平通电以来，始终促蒋介石的翻然觉悟。然蒋介石为共产党分子所劫持，除加强抗日之外，自身已无安全之途，乃不得不和汪精卫先生背道而驰。本年七月九日，汪先生发表历史的广播，题曰“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，”和蒋介石绝缘，联合忧国之士，开始向中日提携之目的前进。在此声明中，汪先生

坦白接受近卫声明的三原则——即善邻友好，共同防共及经济提携，甚至呼吁“无日本即无东亚”。汪先生决意的根底为“反共建国”，甚为明白。声明中有一段说道：

“共产党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民族，有所谓国家。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，要把中国来牺牲……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：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，以蒋现有的兵力，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，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，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。这样下去，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。另一条路，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，重新的实行起来，对于日本，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，努力于转敌为友。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，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。这两条路，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，后一条是复兴中国，复兴东亚的路。我决定向复兴中国，向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，我决定团结同志，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同志之士，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。”

又汪先生最近在大阪每日新闻及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一文，题为《欧战与中国的前途》，其中也说道：“共产党人是不知有自己国家，不肯为自己国家打算的。……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自从抗战以来，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，是有共产党人夹杂在里面。他们的抗战是为第三国际而抗战，……他们只知为第三国际打算，不为中国打算，……这是我离开重庆的原因。”这几句话，已明快地说明了他离开重庆的理由，是在于排击共产党主义及共产党。

汪先生于今年夏天来东京，会见平沼首相及其他若干人。我也是其中的一人。会见平沼首相时，平沼首相对汪

精卫先生说道：“凡尔赛条约，充满着胜败偏见和功利思想。其结果，遂引起了世界今日的局面，甚至不能维持由他们自己手创的国际联盟。此次事变的和平条件，是日本用道义观念代替功利观念；不仅不以胜败的偏见对付中国，且有共患难安乐的诚意：须这样，东亚永远和平方可确保”。汪先生对之，也很满足，这是汪先生在九月一日《致海外诸同志东电》中说得明明白白的。

×

×

×

我曾敦请汪先生到目白的自邸，和他交换意见，达三小时有半。我不谙华语，汪先生不谙日语，乃用我“自己式”的汉文笔谈。假若用口谈，大概一小时就可竣事的吧。谈话的内容，即在将来，也不便加以发表。但那时我已以《近卫声明》的负责人的资格，表明决意。因知当日俄战争后朴滋茅斯条约的内容，招得国民的不满，发生帝都放火事件之时，汪先生适在东京留学，目覩事件，所以我说道：

“对于此次事变，若用旧时的观念，则割让领土及赔偿战费，是当然的媾和条件；国民之间，也有对如此的战果，如此的牺牲，抱着重大报酬的期待者，但我们却不要求割让领土，赔偿战费，仅止于道义的要求，故深忧国民间或将发生不幸的事件。但我们胸内，早有克服此种难关，忠实遵奉近卫声明的悲壮决意。可是声明发表之后，却未闻国民间有不满之声，这使我人吃了一惊。我想，这必是因为日本全体国民，已认识此次事变所加于国民的使命，并其使命的道义性，愿作圣洁的奉行。全体国民有此认识，则近卫声明的完全履行，当已毫无疑问了。”汪先生闻之，似深为感动。

×

×

×

汪先生是承继孙逸仙先生衣钵的国民党最大长老，也是蒋介石的前辈。虽然过去一再亡命海外，备尝披荆斩棘之苦难，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好绅士。他的风采看不出在三十年之前，曾持炸弹，谋刺清摄政王的热血汉。尝闻在博浪沙以铁椎击秦始皇的张良，其貌宛似女子，因之我想汪先生莫非是张良的再世，曾端详的看视这位政治家。汪先生尝在谈和平便被斥为汉奸的重庆，呼吁和平。到河内后，虽遭渝方刺客的包围，还是发表了第二次及第三次劝告和平的声明。他的股肱曾仲鸣氏被刺后，汪先生说道，“予也将追曾仲鸣先生之后”，而以更大的力量，致力和平工作。白皙长躯的汪先生，竟流溢如此大勇气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汪先生驳斥视孙逸仙先生的遗嘱如敝屣的蒋介石一派的人士，热泪濡颊的热情，在五十七岁的今日，还是沸腾于胸中。堪称永远青年的魅力，使这位革命的政治家做了新中国的指导者。我的意见，似乎使汪先生很满足，汪先生的意见，也使我钦服。

我信汪先生在东京和我国朝野会见，一定对建设新中国得了更大的确信而归国的。

自此以后汪先生更明确信赖《近卫声明》愿求国民和日本合作，协助建设东亚新秩序。中国国民，现在究有多少人共鸣并协助汪先生，我国不敢推测；然我们却确信，全中国的国民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即将离开日趋没落的渝方，来归汪先生指导的。这一方面是汪先生的责务，同时，我们也愿对中国国民呼吁，坦白信赖近卫声明，乃是中国国民的幸福。汪先生于八月杪，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组织以反共亲日，排除一党专制为基本政策的纯正国民党，把被国共

合作所歪曲的三民主义，恢复到孙逸仙先生昔日的主张，提倡纯正三民主义。新中国的建设，应用纯正国民党的组织及纯正三民主义，是毫无疑问的。我国国内，也不无对国民党及三民主义未表全幅赞意的人士；照我想不论国民党或三民主义，其发生的弊害，不在于党与主义，在于加以运用的人如何。例如以民族主义供统一国内的工具，视日本为敌国，动员全中国的国民于排日阵线，或为达成民生主义，排除各级的协力，采用阶级争斗，都是由国共合作所产生的歪曲。若依纯正的手段实践，则毫无担忧的必要。兹汪先生等既决定树立中央政府，信赖近卫声明，和我国提携则关于大纲，自然应该充分加以指导，使勿留祸根于将来；但琐小的事，中国有中国的传统，习惯，尤其自治是他们的长处，故不妨在大体上由中国国民负责，不可妄加干涉，而应共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，等待十年廿年之后开花结实。我们不可以为此种历史的巨业，是可在短期间内完成的。日本国民，此际对此点应加特别留意。

（昭和十四年十月十日）

（录自汪伪宣传部编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

1941年3月版）

论目下中日间之根本问题

(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)

日派遣军报道部长于二月八日广播，说明青岛会谈之情形及阐述坂垣总参谋长谈话之精神，对于和平，致其敬意与赞助，论述中日之根本问题，拥护和平主张。

最近汪精卫氏在青岛与临时，维新两政府代表，为调整中日关系及建树中央政府问题，举行所谓青岛会议。会议之进行，甚为顺利；终于三方意见，完全一致。在青岛报告会议经过时，集合之中外新闻记者，将近百人；闻及会议结果之意外圆满，俱不胜惊异。尤以远赴青岛之外人记者，对于该会议异常关心，兹特将彼等对余所述之感想，介绍数点于左：

会见汪兆铭后，可得信念坚强，异常热心之印象。

汪兆铭之和平建国运动，不意其已至于此；初以为宣传而已，于今始知甚为真挚且具有内容。

吾人于会议多忙中，得与汪兆铭两度会晤；其时并无日人参加，开诚布公，畅所欲言。凡有质问，俱得明白解答，无何推委之处。

吾等常与日方发言人接谈，每次中日记者俱参加在内，亦甚少拘束。有时且与中日记者，团座一席，虚心坦怀，交换意见。

总之，彼等初意以为汪精卫之和平运动，不无阴谋策略参与其间；及至明瞭其公明正大，信念坚强，始得以启其蒙。今对和平运动素无好感之第三国新闻记者，既有此印象，想嗣后东亚问题之发展，必更饶有意义矣。

青岛会议之结果，行将促进新中央政府之成立；对于中日国交调整前途，亦投下一种光明，为中日两国之将来计，殊足庆幸！

青岛会议告终时，坂垣总参谋长适值因公留青，既对会议成功，有所祝贺；复于中日根本问题，加以阐述。此次谈话，亦曾掲載于国内报章；意者惟有谈话内容所含蓄之精神，始堪为目下与今后中日根本问题解决之关键；其意义之重要，不啻第二个近卫声明，谨略加衍述以求通俗！

欧美诸邦及中国人士，固不待言；即日本人中，对于所谓东亚新秩序之内容，亦多有怀疑者。但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理想，实渊源于我肇国精神，亦即在于八紘一字，万邦协和而已。

东亚各国家民族，俱得安居定处，善邻友好，相互援助，各尽其能，兴隆发展，此即东亚之新秩序也。

故东亚新秩序之中心思想，一言以蔽之曰：东洋道义文化之复兴与发展是也。意即东洋恢复原来之东洋，日本与中国，各还其本来面目；至其综合也，则以东洋共同原有之传统——道义；于是而东洋精神文化，深信其可发灿烂芬芳之花；凡东亚之事，一以道义为本，既尊重国家之独立，复调和国防经济等国家相互间之提携协力关系，即进而使东洋道义文化，有所恢复，并得以发展！此前已屡加阐明者也。

复兴东亚问题，乃中国与日本肩负之重大使命，苟中、